

中篇小说新作

空

气

灯

彩色的梦和金色的网

满

院

春

光

青

春

的

旋

律

“老

洋

人”

外

传

3

47.5
6/3
监

星

事

件

责任编辑 单 纯

封面设计 朱鸿年

中篇小说新作(3)

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
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

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16开本 14印张 263千字

1982年8月第1版 1982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7,000册

统一书号10105·365 定价1.11元

I 247 . 5

546, 3

中篇小说新作

目 录

空 气 王不天 (1)

灯 乔典运 (34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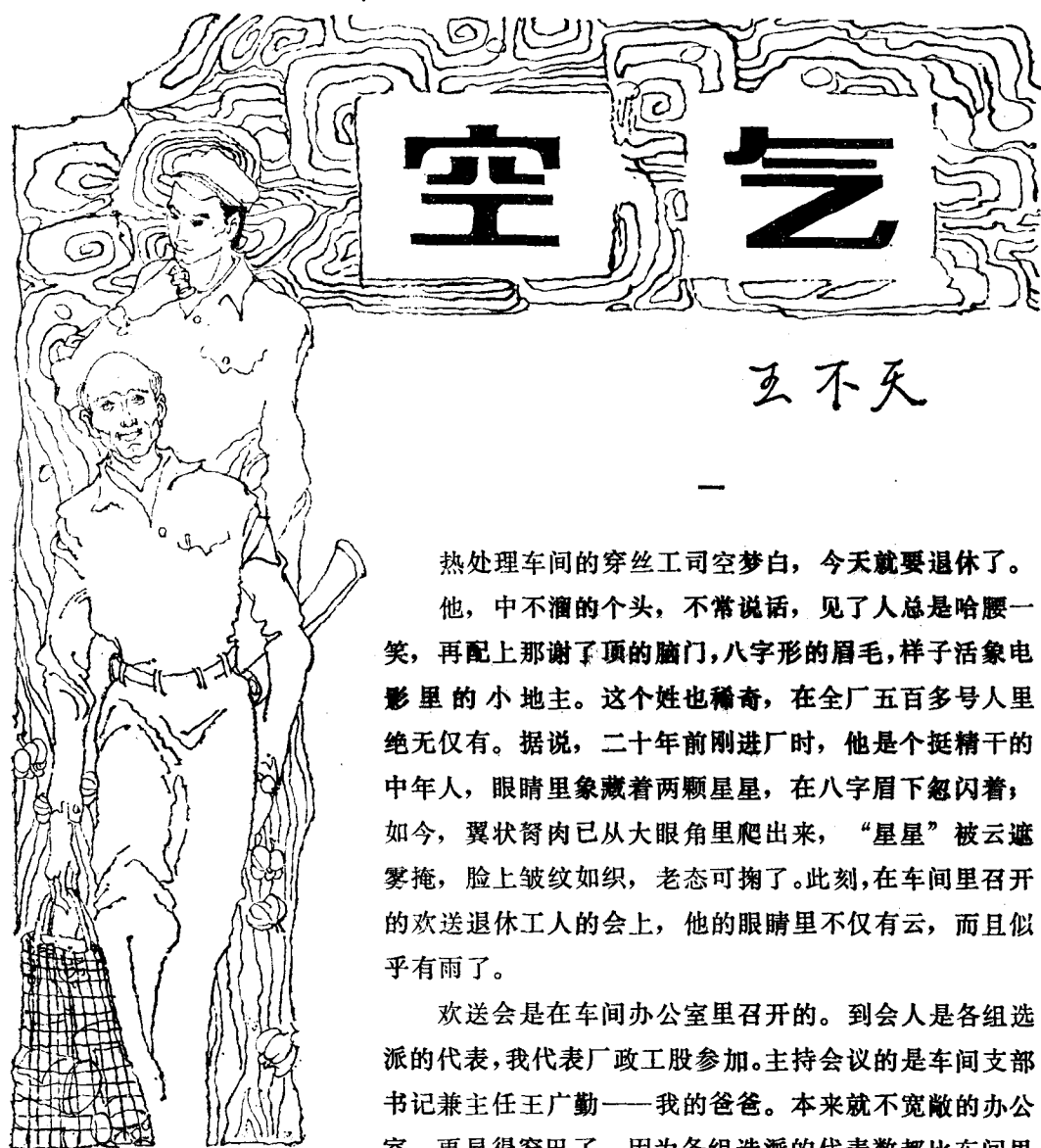
彩色的梦和金色的网 . . . 陈 慧 (74)

满院春光 徐 慎 (99)

青春的旋律 李志林 (127)

“老洋人”外传 李克明 (16)

蓝星事件 谈英



空气

王不天

热处理车间的穿丝工司空梦白，今天就要退休了。

他，中不溜的个头，不常说话，见了人总是哈腰一笑，再配上那谢了顶的脑门，八字形的眉毛，样子活象电影里的小地主。这个姓也稀奇，在全厂五百多号人里绝无仅有。据说，二十年前刚进厂时，他是个挺精干的中年人，眼睛里象藏着两颗星星，在八字眉下忽闪着；如今，翼状胥肉已从大眼角里爬出来，“星星”被云遮雾掩，脸上皱纹如织，老态可掬了。此刻，在车间里召开的欢送退休工人的会上，他的眼睛里不仅有云，而且似乎有雨了。

欢送会是在车间办公室里召开的。到会人是各组选派的代表，我代表厂政工股参加。主持会议的是车间支部书记兼主任王广勤——我的爸爸。本来就不宽敞的办公室，更显得窄巴了：因为各组选派的代表数都比车间里预定的数多；还有不少人挤在窗子外边呢。人总是这样，

常在一起，不觉得怎么样；一旦分别，总有点依依难舍，何况，将要分别的这个小地主似的老头，又是那么和善的人呢！来自各组的代表，进行着热烈的发言，给他摆出许多好处：干活不惜力呀，工作任劳任怨呀，坚守岗位呀，团结同志呀，等等等等。大家

对他的称赞并不夸张，有这样一个事实就足能说明问题：青年人，特别越是滑头的小青年，就越是喜欢和他分在一起干活。

听着大家的夸奖，他一言不发，脸上的肌肉不住颤动，老眼里有泪花在闪，嘴角上浮着笑意。那笑里掺搅的是苦还是

甜？谁知道呢，也许都有吧。

我爸爸，这个主持会议的人，认真地听着大家的发言，自己倒很少说话。他的脸上含着复杂的表情，心情显得沉重。但他终于发言了，语气沉得象铅块：

“司空师傅，是个好同志。受了……二十多年的委屈。我也……把你……当成坏人……整过。”说着，爸爸的声音哽咽了，泪水流到了鼻梁里。他用指头把泪水刮去，接着说：“你一肚子学问，烂在了肚里，没能使出来，不声不响地掏粗力，流大汗。好不容易盼到了出头的日子，可又急急忙忙退休了……”

会场里的气氛由热烈变为肃穆。我虽然进厂时间不足五年，可关于他的情况还是知道个大概的，也为他感到心酸。

司空梦白笑了，但泪珠也同时滚出眼眶：“过去的事，已经过去，不要再提了。只是……”只是什么呢？他嘴巴骨蠕动着，欲言又止。

去年才从部队复员的车间支部书记袁勇军说：“司空师傅，有啥话你就说吧。现在还顾虑啥呢，不是那些年了。”

我爸爸也说：“你说吧，在临别的时候，给咱车间的工作提提意见。特别是对我和小袁，多提提。我老觉得，多少年来，你喉咙里卡着一句话，不敢往外说。今天你就说出来吧！就是说错了，也没事儿。我要抓你的辫子，我……我不是人！”

爸爸是从工人中提拔起来的干部，曾经以大老粗而自豪过；如今，他虽不那么自豪了，可老粗话还不时地冒出来。他喜欢激动。有时一动了感情，说话就这么个

味儿。会场里有人笑。这笑是对我爸爸这种诚恳态度的赞扬。

司空师傅显然也被车间主任的态度感动了，他嘴唇动了动，却抬头看了看我，又没说什么。

啊，是害怕我这个政工股下来的女干部吗？也难怪呀，这些年来，他这样的人，确实对“政工”、“专案”之类的字眼产生了过敏反应。我不敢迟疑，马上表态：

“司空师傅，我是诚心诚意来参加这个欢送会的。过去我们在工作中错整了不少人。那种时代一去不复返了。难道你还不相信我们的党吗？”

谁知道，我的表态非但没有使他放松，反倒使他紧张起来。他打了个哆嗦，赶紧表白：

“不不。我，我，我相信党，相信党！”

天呐！他脑门上都冒汗了。

我一琢磨，问题出在这最后一句上了。真糟糕！这不是又给人家扣了一顶“不相信党”的帽子吗？我只得赶紧解释：

“不不不。司空师傅，你把我的话误解了。我是说，我们党已经总结了历史的教训，决不会重犯过去的错误。你应该……反正你理解我的意思就行！”

我恨我自己笨嘴拙舌，真想象爸爸那样发誓赌咒。

小袁虽然年轻，工作方法却有一套，不象我爸爸那个直筒子。他考虑了一下，说：“司空师傅，你要是不想在这个会上说，咱们个别交谈也行。你在咱这车间二十多年了，比有些小青年的年龄还长呢，如今临分别了，你就一句话没有？”

司空梦白终于开了口：“我有话，有一句话，要在这会上说，还想对全车间每个同志都说……”

可是，他看看我，又把话咽住了。嗨，这究竟是一句什么宝贝话呢？

会场里不少人催他：

“司空师傅，你快说吧！”

“咳，你咋还是那个味儿呢？”

“王莹也代表政工股表了态，你怕啥呀？”

“严股长知道了，也不会咋着你的。”

“谁敢揪你的辫子，大家给你撑腰！”

“有党给你做主！”

“……”

挤在窗子外边的人也在喊喳。喊喳的啥，我就听不清了；反正也是为他这一句话说不出来而焦急。

我站了起来：“司空师傅，你要真害怕我，我退席！”

“哎呀，姑娘，”他连忙起身拦住我，“我不怕。我说，我说，你坐下，我说。”

我坐下了。他咳嗽一声，定了定神，这才说道：

“我是说，希望大家，多吃大蒜！”

怎么？竟是这么一句话！屋里屋外都愣住了。

他又补充说：“要经常吃，天天吃。”

全体听众都迟迟没愣过神来。又听他说：“我再教给大家一个储存大蒜的办法：把最外一层蒜皮剥掉，在液态石蜡里浸一下，拿出来，就象蜡封的中药丸那样，吃到第二年新蒜下来没问题。”

大家还是象哑巴一般，支楞着耳朵等

待下文。等到的却是两个字：

“完了。”

说罢，他如释重负般地舒了口气，用手帕擦了擦汗津津的脑门。

全场哗然。别管谁再讲什么，他也不吭声了。哦，这就是他憋了多少年的一句话吗？其实，这话他也没憋住过，我就听高枕说过司空师傅有个爱吃大蒜的习惯，还常劝别人多吃大蒜。问他为啥？他就说：“你没看报纸吗？大蒜有很高的药用价值，对人体健康大有益处。”有一天我下车间劳动，和他在一起干活，除了干活中必须的话以外，他一句闲话也不说，而且尽量离我远点。可是到中午吃饭时，他却主动地把自己捎的蒜拿给我，说了一个字：“给。”就走开了。

小袁和我爸爸对视了一下。大概他两个也在纳闷：这就是司空梦白的临别赠言吗？这个在热处理车间倒霉地干了二十多年的人，这个寡言少语、满腹学问都沤烂在肚里的人，费这么大劲才说出的话，究竟包含着什么意义呢？

可是，任谁再问，他也不再说什么了。我甚至怀疑，他是否由于多年的挫折和退休前的一时激动而神经失常。我仔细地审视着他的眼神、表情，一点也没有发现病态的迹象，他很清醒，很正常。

欢送会，在一片猜谜般的喊喳声中，散了。

二

一星期后，这个没解开的谜，就在我

头脑中淡忘了。

这天早晨上班不久，我正在整理图书杂志，严股长叫住了我：

“王莹同志！”

可能是过去长期与被整对象打交道的缘故，他面部的结构、线条已形成了固定的、严肃的模式，不苟言笑；对平级和下级，不是老张老王、小刘小李，而是要称全名而且挂同志；对上级则必称官衔。此刻，他脸上比平时更多了几分严肃，吩咐我说：

“你把手里的工作暂停几天，到热处理车间摸摸情况。那里最近出了一些问题。”

他在“问题”二字上加重了分量。我不禁愕然：

“啥问题？”

“问题比较严重。不少青年，不安心工作，纷纷要求调出车间。王广勤同志急得不行，向厂里反映了这个问题。问题的根子在哪儿？属于什么性质？等你调查摸底之后，我们再研究。”

哦，是这么回事！怪不得这几天爸爸回到家里老是吊着脸，半夜里还唉声叹气。

我故意问：“会不会是阶级斗争？”

严股长大概看出了我有意调皮，就把脸拉长，眼睛盯住我：“怎么？你以为一定不是阶级斗争方面的问题？王莹同志，阶级斗争没有结束！社会上违背甚至反对四项原则的言行，难道不是阶级斗争的反映？再者，还有打击犯罪分子的活动，不也是阶级斗争？只不过现在不这么提就是了。你再看看街上那些穿喇叭裤的，有几个是

好人？追求西方的生活方式，满脑子吃喝玩乐，这不是资产阶级思想对青年一代的腐蚀？……”

严股长不愧是搞政治工作的老手，讲起道理一套一套的，而且富于感情色彩，表现出对“喇叭裤”们的深恶痛绝。就在这时，走廊里传来录音机的响声，有点象迪斯科舞曲。同时，一个娇滴滴的声音在呼唤：

“爸爸！爸爸！”

严股长停止了对我的训导。他气呼呼地转过身去，和刚好走到门口的女儿打了个照面。

“哎哟，爸爸，你让我好找！”

“快把录音机关掉！”严股长低声喝斥，“大家都在办公，你提着哇哇响的录音机胡乱转悠，象话吗？”

录音机不响了。

这姑娘原名叫严敏，是严股长的大女儿。她前年高中毕业，没考上学，厂里内招时，进厂当了学徒。劳资股开始把她分到了机修车间。这个车间的活技术性强，很多小青年都羡慕这里。可是，她只干了三个月，就换了三个工种，说啥也不干了；说当车工站得腰疼，当钳工磨得手疼，当焊工晃得眼疼，要求调到厂化验室。尽管严股长有言在先：“不能迁就她的无理要求，要从厂里的工作考虑。”但劳资股还是把她调到已经超员的化验室了。都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，她把自己的名字后边加了个“子”。谁叫她严敏，她连脸都不扭；叫她严敏子，她才笑嘻嘻地和你答话。据她解释，这么一改就象个日本名字了。

日本不是有许多女的都叫什么子吗？她的发型多变，有时是披肩发，有时烫成大菊花，有时扎成马尾巴。喇叭裤也“喇叭”得出形，走路扫着地。严股长经常训她。有一回一气之下，把她新买的喇叭裤剪了。她大哭大闹一场，第二天又买了一条。提起这个不争气的女儿来，严股长总是摇头甩手加叹息，随后就是把拳头捏得格巴响。他大发感慨：“阶级斗争不讲行吗？青年都成啥样子了！”

“爸爸，有人出差到天津去，我想让人家捎几盒西林蜜，钱还不够。”

“什么？什么蜜？”

“西、林、蜜。”

“稀……嘿，管它稀的稠的，咱们市里蜂蜜有的是，还要跑天津买？”

“哎呀，爸爸，你真是跟不上时代了！”严敏——哦，严敏子急得直跺脚：“西林蜜是八十年代最新美容佳品，纯乳精制，营养皮肤，嫩艳光润，永葆青春，天津百货采购供应站经销。”

严股长的脸枯皱成一团了，冷冷地说：“到化验室这么长时间了，我听别人反映，你连常用的数据和那几个外国字母都记不住。哼，背化妆品广告，你的记性倒蛮好！”

严敏子嘴撅得象朵喇叭花儿：“爸爸，你也听他们闲嚼舌头？A、B、C、D、E，我不会？英语常用对话，我还记得不少呢！pig你知道是啥意思吗？不知道吧，是‘好’！”

我捂住嘴笑了：她把“猪”当成了“好”。

严股长摆摆手：“算啦算啦！就会这么几句，别逞能了。瞧你这身打扮，再看看人家王莹同志，你应该向王莹同志学习！我就没见过她用这蜜那蜜的，人家一心都扑在了工作和学习上。你可好！”

严敏子翻眼瞅瞅我，撇撇嘴说：“蒜调萝卜菜，各自心里爱！”

“那种稀啥蜜别买啦，家里还有雪花膏哩。”

“哎呀，你咋老是拿五十年代的眼光来要求八十年代的青年？僵化！”

“毛主席说……”

严敏子把耳朵一捂：“凡是派，我不听！”

严股长气得脸色铁青。看来，这父女俩谁也不肯做出让步了，我只得打圆场：

“严股长，青年人爱美的心理，你应该理解。哪能老搽雪花膏呀？前天我还买了珍珠霜呢。生活毕竟在前进。西林蜜确实不错，是比较先进的带有药用价值的化妆品，《新观察》杂志上登了的……”

严股长不等我说完，厌烦地一挥手：

“别给我上这号课！”然后，掏出十元钱，往女儿脸前一扔，说了声：

“滚！”

严敏子拾起钱，往肩上挎的红塑料包里一塞，对我感激地一笑，飘然而去。严股长却气呼呼地往藤椅上一蹲，手捧脑袋，半晌说不出话。

三

当下，我把一地杂志图书一收拾，就

来到热处理车间。烧炉工正在往炉膛里添煤。粉尘弥漫，烟雾腾腾。鼓风机可着嗓门叫唤。平炉北头，十几个套着钢丝的络子排成人字形，吱扭吱扭地旋转；平炉南头，经过加热和铅淬火后的钢丝，带着一层烤蓝色，被缠在卷丝机的卷筒上。这个车间的活虽脏，但不算很重，又有三毛钱的营养费，所以，工人们还是比较安心的。那些巴望着分到机修车间或化验室的小青年，如果巴望不到，也就把这里当成了第二志愿。为什么突然之间，会有许多人纷纷要求调定呢？真叫人费解。

“王莹！”

谁叫得这么好听？噢，高枕！他坐在车间靠河边一侧的门口，手里拿着本杂志。夏天，卷丝机旁太热，当车走得顺当时，下丝工常常坐在这个门口，河面的小风习习吹来，比坐在风扇前边美多了。

我走过去，在他旁边坐下。他指着杂志里的一幅照片说：

“你看，人家西德的一家工厂，工人坐在电视机旁，就可以操纵车间里的机床了，我们这里可好！”他说着，用食指朝烟雾腾腾的空中画了个半圆，又“唉”地一声，叹了口气。

我看看照片和一旁的文字说明，又瞄了瞄车间里的环境，不以为然地说：“只要我们努力，顶多不过十年，咱们也会象他们这样！”

“人家再过十年不知道又先进到哪一步哩！”

我说：“我们不会再赶。”

高枕摇了摇头，说：

“人家美国，百分之九十八的人家都有电视机，百分之七十六的人家还有两架电视机。可我们那条胡同，只我们家有一台十二英寸的黑白电视机，一有好点的节目，全胡同的小孩儿、老太婆都掂着小板凳过来了，烦死了，也没法撵！”

“那你比我家还强哩。一说买电视机，我爸爸就说：‘买那弄啥，有半导体收音机听着就行啦。’真拿他没办法！”

“中国的电视、电影都没啥看头。”

“最近出的几部片子还可以。”

“那也无法和人家外国的比。你看人家那片子，真叫帅！”

“不要总看不起自己！”

高枕翻了我一眼，不吭声了。

谁说“高枕”无忧呢？我们这位高枕，整天忧国忧民。在这个问题上，我们俩有很多共同语言。他个子长得条干，脸盘又标致，风度又潇洒，厂里好几位穿喇叭裤的女青年都对他表示过“意思”。他一概不睬。严敏子也追过他一段。他说闻见敏子身上的香水味就头痛，又老嫌敏子的裤腿走路绊脚。把敏子挖苦得哭了好几场。不知不觉，我暗暗喜欢上他了，总想听他谈话。他的知识面广，外国的东西懂得很多，谈起来绘声绘色，好象他刚刚周游列国归来。而且喜欢和中国对比。比的结果，总叫人泄气。可对他的论据、逻辑又驳不了。有一次我半开玩笑地说：“要是外交部长兴民主选举，我投你一票！”他兴奋得满面红光，说：“当外交部长，我兴趣不大；能得到你这位知己，实在三生有幸！”一下子说得我脸红了……

我忽然想到这次下来的任务，何不向高枕做个调查呢？

“为啥最近有不少人突然要求调出车间呢？”

“我还要求调出呢，请调报告都写好了。”

我更感到事情严重了：“到底为啥？”

“因为铅毒。”他指指铅锅。

所谓铅锅，就是钢丝淬火的铅溶槽，铁的，象条船；下边烧火，上边用木炭和炉渣覆盖，让钢丝从铅溶液里穿过。按照工艺规程要求，铅溶液要保持摄氏五百度。正因为有铅毒，才有三毛钱的营养费。多少年来，大家都平安无事地过来了；对什么铅毒不铅毒，习以为常，谁也不当回事；在冬天有的小青年夜班还坐在铅锅旁边打盹呢。为什么铅毒突然之间象老虎一般，把人们吓成这个样子呢？

当我提出这个问题之后，高枕又是一声长叹：“唉！什么文明生产，科学管理，咱们厂不讲究这，只讲究产值。在这么个愚昧的环境里，连我对铅毒的问题也麻痹了。是司空清敲响了这个警钟，才引起大家的重视。”

“司空清？”

“就是司空梦白的儿子。他是顶替他父亲上班的，真是了个了不起的人物！”

“噢，他刚来厂一个星期，就……”

“不在于来厂的时间长短。我来四年了，在这个问题上，是傻瓜，白白地吸了四年的铅毒。你爸爸在这个车间当了二十多年的车间主任；这车间、大炉、铅锅，是他亲手建起来的；大老粗，无知，光知

道牛一样地干活，也不知道吸肚里多少铅呢。可人家司空清，就有个科学的头脑。进车间的第二天，他就从市防疫站借了一个空气分析仪，把铅锅附近的空气一测量，好家伙，含铅量零点零五。按国家规定，超过零点零三就不允许了。他又宣传了铅对人体的危害，这一来，谁还敢在这个车间干呀？别说三毛营养，给一块也没人干。”

“噢……”

“听司空清讲过以后，我找来书翻了一下，铅中毒确实厉害。主要症状是食欲减退，恶心，口中有金属味，嗜睡，身上无力，记忆力衰退，精神不振。铅积存骨骼里，可以使骨质疏松，造成骨折；最后铅侵犯大脑，可以发展为铅脑病——这就是精神病了。我看你爸爸的神经就有点不正常。你回忆回忆他的表现，是不是？”

我想了想，说：“他脾气大，固执得要命，精神是有点不正常。我原来想这跟他年纪老有关系，看来，是有铅的作用了。对，还有，他走路常打软腿，每天都显得很疲累的样子。可他能忍，要强，轻易不叫累。”

“看看咋样！科学这玩艺儿违背不得。我最近也感到记忆力衰退了。”高枕后悔莫及地说。

我的心揪紧了，说：“这个问题得赶紧向厂里反映，迅速解决！”

高枕耸耸肩膀，挑挑嘴角：“哼！咱厂的老爷们还管工人死活呀？工人们可不会在这里挺着等死，只有一个法儿：走。”

“都走了咋办？厂里也不能因为这就关门呀！”

“不想关门也好办，”他指指杂志上的照片，“象人家这样，安上闭路电视，让工人坐在二百米外的屋子里操作。”

“这是将来的事了。眼下呢？眼下怎么办？”我犯愁地说。

他苦笑了一声：“嘿，没法儿。”又无限感慨地说，“司空清了不起！中国象他这样的人要是有一分之一，‘四化’也就好办了；可惜凤毛麟角，太少了！”

“他在哪儿？”我恨不得马上见见这个了不起的人。

“被你爸爸叫去挨训去啦！”

我又气又惊：“还要训他？”

高枕摊开双手：“敢于第一个说出真理的人就要倒霉——生活里不是常常有这种事吗？”

我二话不说，咬咬嘴唇，迫不及待地朝车间办公室走去。背后传来高枕不冷不热的声音：“你去也没用。”

四

我还没进车间办公室的屋门，就听见了爸爸的吼叫：

“你散布的这些话，对生产是利还是没利？才来几天，车间里就被你搅成这个样！你爸爸受那么大委屈，也没听他讲一句怪话，发一句怨言，二十多年象牛一样低着头干活。论学问，他不比你这毛孩子的‘水儿’深？他不知道铅有毒？”

我进了屋，只见爸爸眼瞪得象鸡蛋，嘴角挂着白沫，呼呼哧哧地喘着气，已显得声嘶力竭了。但他还不肯住口：

“咱车间这么多年也没见毒死一个人。要照你说的那么厉害，我早就活不成了；可我不是活得好好的吗？”说到这里他拍着胸脯，以证明自己活得很好。“我也承认铅有毒。没毒国家每天发三毛钱营养补助费干啥？就是让工人补养身体的嘛！每月还发给两只口罩。可是，都嫌戴着捂得慌，拿家拆了做笼布啦。——同志，要识足。搁旧社会，资本家才不管毒不毒咧。发营养费？哼，没那一说！”

被训的这位，一声不吭。他背对着我，瞅不见脸上的表情。瘦得象根棍儿似的身子，顶着颗圆圆的大脑袋。这就是被高枕极力推崇的司空清？我得看看他的脸。我换了个角度：哦，是一张洋娃娃似的脸型。他脸上红朴朴的，长长的眼睫毛垂下来，显然是被车间主任的威势震慑了；紧绷嘴唇，大气儿都不敢出。嘿，他哪里有半点儿了不起的样子呢？

屋子里还有一个人是小袁，从部队新转业的车间党支部副书记。他坐在那儿，满面阴云，一言不发，在看一本厚厚的书。他倒是个能沉得住气的人！

“你要写一份检查，下午交来！”爸爸结束了他的训话。这时似乎才发现了我的存在，看了我一眼，但是没理睬，又回头对小袁说：“你有啥要说的？”

小袁略一沉吟，用商量的口气说：“我没啥。写检查的事……缓一缓再说吧。”

爸爸想了想，对司空清说：“今天你好好考虑考虑，三天之内，把检查写好。你有啥要说的？”

司空清抓抓脑袋，眉头稍稍一蹙，随即抬起了黑而密的睫毛，露出一双闪闪的眸子。这双眸子，象刚从水里捞出来的珍珠，湿漉漉的。哦，似曾在什么时候见过。在什么时候，又是在什么地方呢？

那眼睛里汪着的，是委屈的泪水。他要说什么呢？是屈服？还是坚持？小袁从书本上抬起了眼睛，看着他。我把心提到了嗓门，想着他一开口就给以声援。我爸爸扎着架子，准备对付他的反抗。

可是，他看着我爸爸的脸说了句：“王师傅，你的齿龈铅线已经很明显了！”却一转身，走出了办公室。

我不由自主地跟了出去。跟到半路喊住了他：“司空清。”

他站住脚，回过脸，打量了我一下。那眼神分明在说：“车间主任已经放我走了，你还要干什么？你是谁？”

我赶紧解释：“我是政工股的。我想找你了解一下铅毒的事儿。”接着又补充一句：“如果你确实是正确的，我会支持你。”

“哦……”他解除了戒备，松快地笑了笑。“那你说啥时候谈？……快该下丝了，我得赶紧干活去。”

我想了想，说：“我现在去换上工作服，咱们一边劳动，一边谈。”

“那敢情好！”他乐得象个孩子，那张洋娃娃脸上漾满了笑意。

看着这张娃娃脸，看着这双包在秀美的长睫毛中的眼睛，我越来越感到似曾相识；直到他的背影走进腾腾烟雾之中，我还立在那儿，努力追忆着。十几年前的一

幕，徐徐浮上心头——

那是一九六七年春天。一列广州直达北京的快车，在豫北的一个小站被上访的红卫兵截住了。我很幸运，不仅挤上了车，而且找到了座位——我是经过努力奋斗从窗口进的。刚刚坐定，只见车厢门口起了一阵大的骚动。一个穿蓝学生装的学生被红卫兵团团围住了。在这绿军装、红袖章的海洋里，他的装束显得很扎眼。他有十四五岁的样子；长着洋娃娃似的脸盘儿，一双眼睛象星星一般闪着光辉；汗水在脸颊额头冲出一条条泥道子；头发蓬蓬松松，也被汗湿了；领下的扣子滴溜着。可以想象出，他是经过怎样激烈的搏斗才挤上车的。

“你是哪一派的？”红卫兵们在审问他。

“我……没有派。”他红着脸回答。

问：“毛主席号召我们关心国家大事，你为啥没有派？”

答：“因为哪一派都不要我。”

问：“那你准是黑五类啦？”

答：“是。”

问：“你老子属于哪一号分子？”

答：“右派。”

接着是一片怒吼声：

“右派羔子滚下去！”

“北京不是你去的地方！”

“滚！”

“……”

我不禁可怜起这个老实人了。我站起身，大声喊着：“革命的战友们！请不要误会，他是二七战士。”又胡乱编了个名

字：“张卫东，快过来吧，我们正找你呢！”

这一喊，那些乱嚷嚷的红卫兵们都住嘴了，车厢门口顿时静了下来。谁知道他愣了一下，随即声明：“我不是二七战士，也不叫张卫东。”

哎呀！天底下还没见过这么实心眼的人呢。这会儿是需要说谎的呀！难道车厢里的红卫兵还会为你立个专案组进行调查吗？他这么一声明，马上又掀起一片吼声。我挥动双手，极力“挽救”：“战友们！他是害怕碰上老保，不敢承认自己是二七战士。他是郑州十九中的，还是勤务组成员呢。真的！”

“我不——”

见他又要声明否认，我赶紧截断他：

“哎呀！你这个张卫东，你不睁眼看看，这几节车厢全是咱们的天下，怕啥呀？快来吧，还给你留着位儿呢！”

说着，我离开座位，就去拉他。谁料他急扯白脸地申辩：“我不是郑州十九中的，更不是勤务员，真的！是你认错人了！”

真是不可救药！嗨，我算没法儿使了。这一回，红卫兵们不仅动嘴，而且动手了。有的揪头发，有的拧胳膊，连推带搽，外加拳打脚踢，硬是把他推下车了。

列车徐徐启动了。我把头伸出窗外，只见他嘴角流着血，眼里含着泪，可怜巴巴地望着在眼前移过的一个个窗口。我一阵难过，忽然想到，他被抛在这么一个荒漠的小站上，附近连个村庄也看不到，他饿了吃什么呢？我猛地摘下装满馒头和咸

菜的绿挎包，照着他扔了过去。他抬起挎包，看看我，一愣，随即追了过来，还急急喊着：

“同志，你的挎包，挎包掉啦！”

这时，列车已加快速度。他的声音很快被“通哧通哧”的车轮声淹没；人也变成了一个小小的蓝点儿；霎时，便无影无踪了。

列车，风驰电掣般向着北京进发。一路上，红卫兵们又说又笑又唱，激动地描绘着即将到来的幸福情景：天安门前的红海洋，伟大领袖的笑容……可是，我的心却被无名的遗憾和惆怅压抑着，一直在想着那张眼睛含泪、嘴角淌血的娃娃脸。我总觉得，列车后边飘着一个孤零零的小蓝点儿。

……

啊，难道十多年后，那个小蓝点儿又飞到我跟前来了？

五

在干活的间隙，司空清向我讲铅的功过。一个平平常常的“铅”字里，原来有着那样丰富的内容。他懂得真多，连知识广博的高枕都很少能插得上嘴，别的小青年更是象听天书一般。干活时，他很勤快，动作也挺麻利，特别是需要上铅锅的活，他总是很主动。那上边又热，空气中铅浓度又高，这个向别人敲响铅污染警钟的人，却显得不在乎。连最滑头的小青年李文生，也不好意思老在靠河边的门口坐了，走过来递递钳子，接接丝头；等司空

清从铅锅上干完下来，他就把湿过水的毛巾送过来，咧咧嘴说：“快到外边吹吹风儿吧！”——为什么要到外边吹风儿呢？因为车间里的气温高，连风扇吹的风也是热的。正是盛夏酷暑的七月天啊！

早班下班的时间是下午四点。不到三点半，交班的工作基本作完之后，李文生和另外两个小伙子不辞而别，进澡堂了；这是他们过去和司空梦白师傅一块干活时养成的习惯。高枕也要走了。不过，他向司空清打了个招呼，然后对我悄声说：

“今晚上百花影院演《永恒的爱情》，巴基斯坦的，音乐美极了，咱们一道去看吧？”

我问：“几点的？”

“七点二十。卖票的是我的老同学，给我留着好票呢。”他得意地笑笑。“七点以前，在电影院门口东边第一盏灯下见面，不准迟到，啊。”

“下班后，我还想和司空清谈谈。”

“谈啥？”

“铅。”

“哎呀，这几天已经让‘铅’把神经搞得够紧张了，下班还不让脑子放松放松！——我洗过澡就去买票，你也去洗吧。”

“离下班还有二十多分钟，你把司空清一个人扔下？”

“也没啥活了，一个人看着车就行，只剩下等接班的来一交就完。”

我有点恼怒地说：“那你为啥不把自己留下，让司空清先去洗澡？”

“那……”高枕脸红了，“那咋不可以呢！”于是转过身，对正在用铁钩搂丝的

司空清大声说：“司空，你去洗吧，我交班！”

司空清抬起满是汗水的脸，忠厚地一笑：“我留着，你们去吧。”

“不，我留下交班！”高枕的口气流露出慷慨的施舍。

“那……那好。”司空清略作犹豫，答应了。

看到高枕接受我的批评后，能有这样“立竿见影”的行动，我心里十分惬意，就对他笑笑说：“我也走了。晚上六点半以前我就赶到。”

“好咧。”高枕象唱歌似地说。

一出车间门，我就再也见不到司空清了。我们是前后脚出来的呀，他该走得有多快？班组的男更衣室，没有；男澡堂的管理员说没见；厂门口的传达室也没发现他出来。我要找他谈铅，——我被铅迷住了。我还要证实一下那个小蓝点是否就是他，上班时我几次张口要问都被别的事岔开了。可是，他这么快会飞到哪儿呢？

我只好上了办公大楼，想回办公室拿了衣服、肥皂去洗澡。在三楼走廊上，我忽然瞥见热处理车间房顶上有个蓝点儿，一闪就不见了。我揉揉眼睛，只见强烈的阳光照射着石棉瓦铺就的屋顶，视线被烟囱和别的房脊挡着，再也看不到蓝点儿出现。难道会是司空清？他到房顶上干什么呢？强烈的好奇心刺激着我，我决心去看个究竟。

一下楼，正碰上李文生骑着崭新的“凤凰”18型，要出厂门。我喊住了他：

“喂，小李，你们车间的房顶从哪里

上？”

他一只脚点地，问：“你上房干啥？掏麻雀？”

“哎，掏麻雀。”我笑笑说。

“嘻嘻，你还掏麻雀？这可是希罕事儿！——不过麻雀也害怕铅中毒，早飞光了，小心掏着长虫！”

“别废话了，你快告诉我！”

他抓抓头皮：“我可没上过房，谁知道呀！”

“你上夜班经常爬房顶上睡觉，又凉快，蚊子又飞不上去，也不容易被班长发现，你当我不知道？”

他见我揭了老底，只得“坦白”：

“南边那个烟囱，正好挨着我们车间的房檐，就从那儿爬。”说罢，一捏转铃，溜跑了。

小时候，街坊们喊我“假小子”，爬房上树都干过。我按照李文生指的“秘密通道”，并不很费难地上了房，很快发现了司空清。他所在的部位，正是铅锅的上方。那里，插着一截锈烂了的铁桶。我知道，那是铅锅上方吸尘罩的出气口。他围着铁筒，象考古学家在观察出土文物。他向外凸出的额头上，蹭了一大块铁锈，样子挺滑稽的；本来在上班时就被汗水湿透的工作服，这时经太阳一烤，冒着白色的蒸汽，可汗水还继续向外渗着。

“你在这儿干啥？”

“噢，你也来了！——我是想看看，吸尘罩为啥不起作用。”

我笑笑说：“我在办公大楼上看见一个蓝点儿，还以为是‘飞碟’呢？谁知道是

你！”

他也笑笑，没再说啥，继续聚精会神地研究他的“文物”；我却在研究着他。看着他脸上的汗水一滴滴落在脚下的石棉瓦上，心里在想着那滴血的嘴角，含泪的眼睛，那捧着挎包追火车的匆匆一瞥……

我终于发问了：“司空，十多年前，咱们在火车上见过一面，还记得吗？”

他抬起头，打量着我，极力思索，没有言语。

“忘记了？我给起的名字：张卫东。还有那绿色的挎包，上边绣‘为人民服务’几个红字，里边装着馒头、咸菜。”

他如梦方醒：“你就是那个好心的姑娘？”

我苦笑道：“很遗憾，那时你可没理解我的好心。”

他很激动：“我是过了好久才理解的，可惜晚了。多想再见你一面，把挎包还你，买了最好的点心装里边还你，再说声谢谢。——直到现在，挎包我还放着，象放着一个好人的心。”

“一个好人的心！”我从心底感谢他对我的赞誉。能得一个老实人的这么一句赞誉，我非常满足，十多年的缺憾被这一句话填平了。

我问他：“你是去北京接受毛主席检阅的吧？后来乘上车了吗？”

“哪一趟车也不让我乘，我步行去了北京，你那一兜馍可帮了大忙！——在家里，我从收音机里听着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的实况转播，心里直痒；可爸爸怕我惹事，不让出门；我是半夜里跑

出去的。可是，晚了一步，没赶上毛主席接见。”

“我赶上了。我和别人一样欢呼，流泪，可是，我心里一直在想着你那可怜的样子。我真想跑上天安门，向毛主席提个建议，请他老人家专门安排一次对全国黑五类子弟的接见。”

沉默了好一阵，他伤感地说：“十多年，就这么过去了。那时还是个半大孩子，今年都二十九了……”

听得出，他的话后边有个省略号。这六个点里，该含着多少酸涩苦辣？我不忍问。

这时，忽听下边有人叫：“下来！下来！爬那么高干啥？”一听就知道是我爸爸的嗓门。我低头一看，他和严股长正站在河边，看着我们。

我大声回答：“你们也上来吧！”我想让他们也亲自看看“文物”。

“你快下来，老严找你！”爸爸使用了命令的口气。

司空清说：“你先下去吧，我再呆一会儿。毛病很明显，你看：上半截抽气筒已经完全烂掉了，剩下这么短，没有吸力，再说，拐弯的地方也被灰尘堵死啦。下去告诉他们。”

我下来了，站到爸爸和严股长面前，没等他们开口，便把房上吸尘罩抽气筒的情况做了一番报告。最后，我还发表了评论：这种情况早该引起注意了。厂里连个安全检查的专职机构也不设。生产股和车间里就只顾抓生产，不管劳动保护……

爸爸不等我说完，就把手一挥，不耐

烦地说，“中啦中啦！论到你来教育我？”

这么多年了，吸尘罩都是这个样子，不是也没出一件工伤事故吗？咋司空清刚一来事儿就多啦？这个车间每个月都发口罩，要口罩不是防尘的？可是都嫌戴着闷得慌，有的拿家拆了做笼布啦，能怨厂里不管劳动保护？每个月营养菜票发下来，有些人拿到食堂退成了钱，上街买烟吸了，这也怨厂里不管劳动保护？发的劳保皮鞋穿不完，有的拿寄卖店卖了，十二块钱一双，这也怨厂里不管劳动保护？司空清才来几天，他懂得啥？他爸爸不比他学问大呀？”

爸爸这番道理一摆，我一时找不出词儿辩驳了。一直板着面孔的严股长开腔了：

“你的任务完成得咋样了？”

“我做了调查，正要向你汇报。”

“爬到房顶上去调查吗？”

“与调查有直接关系。因为吸尘罩的失效，与空气中铅含量关系很大。铅在三百度就溶化，并且有铅蒸汽放出来。咱们铅锅里的铅溶液是五百度，放出的铅蒸汽是大量的……”我现发现卖，把今天从司空清那儿学来的东西，一股脑儿往外倒。

可是严股长很快制止了我：“我让你调查这个啦？”

我说：“工人们不安心，就因为铅毒严重。”

严股长皱皱眉：“王莹同志，调查研究，要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。表面上，也许是因为铅有这么点儿毒，可实质是什么问题？我要的是实质！”

我讷讷地说：“这，实质上……我看不出阶级斗争的实质……”

我爸爸倒支持我了：“那咋能说到阶级斗争上哩！”

严股长对我爸爸的话没作任何表示，只对我说：“咱俩回办公室谈吧。”

六

由于严股长训话的时间长，我匆匆赶到百花影院的时候，已经七点十分了。一路上，想着严股长的话，我心里乱糟糟的。他说：“当前一个重要的问题，是要教育青年树立一不怕苦、二不怕死的思想。不要老是拿外国和中国比。中国条件落后，就要多吃些苦，应该以苦为荣，以苦为乐。我们决不允许资产阶级思想泛滥。不要以为，有阶级敌人的破坏捣乱才算是阶级斗争……”他的观点有些我是赞成的，比如说，一不怕苦、二不怕死的思想是要牢固树立，不能否定这个口号。可是，司空清提出铅中毒的问题，究竟又错在哪里呢？难道应该永远循着旧章，懵懵懂懂地干下去？这和不怕苦、不怕死有什么矛盾？……

因为失约，我很不安。在影院门口东边第一盏枝形灯下，高枕正和打扮时髦的严敏子对话。严敏子似乎带着哭腔，说话时扭动着腰肢，象个醉美人：

“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，你究竟在等谁？”

“我等谁，你管得着？”高枕很厌烦。

他两个都没发现我。我也不好上前，就站在灯影里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“小高，咱们走走吧。”严敏子几乎是在哀求。

“我不是说过了，和你在一起走，你的裤腿光绊我的脚。”高枕讥讽地说。

严敏子象是背诵电影台词：“你真狠心啊！你用爱情的魔法，俘虏了一个姑娘纯洁的心；可你又用残忍的利爪，把这颗心撕得粉碎！”

“我从来也没打算俘虏你，是你自作多情！”高枕烦恼地看看表，“我该进场了。”说罢，扭头朝影院入场口走去。

严敏子用手绢擦着不知道有泪没泪的眼窝，失魂落魄地站在原处，看着高枕入场，才快快离去。高枕象捉迷藏似地，随即又出现在入场口，向外张望。

我赶紧迎了上去。……

看完电影出来，九点多钟，大街上正热闹。很多人在乘凉。路两厢的摊贩一个挨一个：卖瓜果的，卖烧鸡的，卖馄饨的，卖小百货的，还有郊区农民卖木器家具的，什么都有。我们心照不宣，散着步逛起了夜市。

“音乐确实好听，那旋律真美。”我有点沉醉地说。我们的话题就从刚看过的电影开始了。

“岂只是音乐，你看人家那演员，多帅！”高枕发出感叹。“怪不得卖电影演员照片的，外国的卖一毛，中国的卖五分。工本一样，价格不同。喏，”他指指附近一家挂有“工艺美术服务部”招牌的售货亭，“前天卖三浦友和和山口百惠的照